

# 1993年法国立法选举结果的历史思考

许振洲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1981年以来法国政治的回顾和分析,指出法国社会党在1993年立法选举中惨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前后长达十年的执政过程中,一味被动地适应“现实”,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想、纲领和口号,放弃了自己的特点,泯灭了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区别,因而使选民感到了失望。而社党今后能否重新崛起的关键,也仍在于能否提出一个针对现实的、有鲜明的左派特色的政治纲领和口号。

**关键词:** 法国社会党 立法选举 意识形态 纲领

5年一度的法国立法选举(国民议会选举)已于3月底落下帷幕。其结果可以说是既在预计之中,又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说是不出人们所料,是因为早在此次选举的一二年前,法国各派的政治家及社会舆论界便已公开谈论左派,或确切地讲法国社会党在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中失败的必然性。说这个结果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是因为谁也没有想到右派的胜利竟是如此辉煌。经过3月21日和28日的两轮选举,右派两党联盟在国民议会全部577个议席中一举夺得了460个席位,比上次1988年立法选举多了231席。加上其他一些右派小党的25席,传统右派共占了485席。而左派各党则从1988年的303席下降到了82席。于是右派取得了自第五共和国建立以来的最大胜利,在国民议会中占有了压倒优势,从而开始了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左派的总统与右派的国民议会及政府间的“共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左派遭到了如此惨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意味着什么?它对法国今后的政治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结合法国1981年来的政治进行一些思考和探索。

要真正弄清法国社会党在这次选举中失利的原因,我们不仅需要对社会党政府在12年中的各种政策及实践做一个大致的分析,还应回顾一下左派为何能够在1981年取得胜利。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法国是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想,或曰社会革命思想的发源地(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圣西门、傅立叶、蒲鲁东、布朗基、巴贝夫、饶勒斯……等人在法国思想史、政治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巴黎公社革命更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对社会公正,对尽量缩小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对一个更加符合人道主义原则,更加能够保障人民的一些基本权利的社会向往,不仅在法国大多数人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也深深地影响着法国的政治,给法国社会染上了独特的色彩。如果说它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也确实具有一些不同于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美国的特点。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高盖尔(F. Goguel)和格罗塞(A. Grosser)在《法国的政治》一书中曾指出:“法国人对左倾思想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法国各派政治力量也大都愿意给自己贴上‘左派’或‘激进’的标签。”<sup>①</sup>戴高乐派的保卫共

和联盟是目前法国右派中的主要力量，但戴高乐将军本人却从不掩饰他对“资本主义”这个词及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反感。至少在他看来，法国社会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他所追求的也不是这样一个社会。

尽管法国左派势力在西方各国中相对一直比较强大（法共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内还曾是法国第一大党），但到1981年为止，法国一直由右派统治着（1936年短暂的人民阵线可算是一个小小的例外）。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戴高乐将军在法国人民中的个人声望，由于单记名两轮多数选举制的确立，更在表面上使得右派政权的不可动摇性无可置疑。而左派力量，一方面由于国际形势的不利影响（如50年代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匈牙利事件及60年代的布拉格之春），另一方面由于纲领口号的不够明确及内部力量的不协调（尤其在法共与社会党之间），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看到掌握政权的现实可能性。法国政治学家马比罗（A. Mabilleau）在《法国政制》一书中曾指出：“法国的政治制度，正如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制度一样，在理论上保证了左派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从未成为过现实。大多数人也不相信它会成为现实。”<sup>②</sup>

但事情在慢慢地起着变化。50—60年代欧美高速的经济发展，一方面使法国社会达到了表面上的繁荣，一方面使社会上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广大劳动者感到自己没有能够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所应该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同时，越南战争在整整一代青年中造成了普遍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希望的破灭。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伦理思想在青年人中失去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人们开始厌倦现实政治，希望看到一定程度的变革。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法国1968年席卷全国的五月风暴。运动中著名的口号“十年，这已经足够了！”（指戴高乐政权已存在了10年）充分显示了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如果说左派各政党由于惊慌失措，由于未能坚定地站在学生、工人一边来领导、参加这场运动，因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受益者的话，右派的统治却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而戴高乐将军的辞职及7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损害。

左派力量终于认识到了这种形势的意义并开始了行动。1971年6月，埃比内大会宣告了统一的社会党的诞生，从而结束了社会党方面的分裂和软弱的局面。被称为法国二战后最机敏的左派政治家的密特朗成为第一书记。他认为“我们应立即准备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为此目的，必须首先与法共一起制订一个共同纲领。”<sup>③</sup>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讨论，法国社会党和法共终于在1972年6月27日签订了《共同纲领》。不久，左派激进运动也在纲领上签了字。签字各方同意将此文件做为在未来的各级选举中的共同纲领，并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各方协议产生的共同候选人（通常是那些在第一轮选举中得票最多的）。纲领提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对法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或改造，其口号是：“改造我们的生活，改变社会的航向。”

共同纲领虽然没能立刻使左派赢得1973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和1974年的总统选举，却对法国政治在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81年5月的总统选举中，右派集团内部的分裂，左派力量的联盟及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形成的《110条政纲》的号召力终于使左派的共同候选人密特朗在第二轮选举中击败了右派候选人德斯坦，从而成为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左派总统。在同年6月提前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取得全部491个议席中的285席，共产党取得44席。左派成为国民议会中的多数派，并组成了以社会党为主的，有共产党参加的左派政府。

左派在1981年的胜利揭开了法国历史的新的一页。正如马比罗所指出的,它第一次在法国这样一个西方国家中使政权在左右派之间的正常、合法交替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成为现实。左派群众,对这场胜利的狂喜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它意味着他们多年来的梦想和为之斗争的目标的实现。它使他们回想起1936年的人民阵线,但这次胜利在各方面的意义都更为重大。至于法国其他阶层的人民,则期待着左派政权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带来一些希望。

一个对法国左派在1981年胜利的原因的简要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它在1993年的失败。法国前总理、社会党前第一书记莫鲁瓦在1984年时曾说道:“81年意味的不一定是左派的胜利,它首先是右派的失败。”<sup>④</sup>他的这种意见无疑是有道理的。自第五共和国建立后一直执政的右派未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道德各方面适应不断变化的法国社会的需要,未能满足大多数选民的要求,因而使他们不得不转而寻求新的领导者。但这绝不是1981年左派胜利的唯一原因。1981年的选举结果也确实为左派的胜利,是左派的思想、价值观念及纲领的胜利。选民们在对现实失望之余,倾向于相信如果按左派的,或曰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来改造社会,会使他们及他们的后代过得更好。他们相信左派的思想、纲领和行动都将与右派的不同,他们看到的将是全新的东西。正如《快报》1981年9月25日的一篇文章描述的那样:“‘用另一种方式生活’这个口号给法国政治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法国人民沉浸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之中。”

在左派执政的第一年里,政府在密特朗总统的推动下进行了一系列的《110条

### 3 政纲》中许诺过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项:

第一,私营企业的国有化。这是《110条政纲》及左派政府的改革中最引人注目、最重要、也是最富左派色彩的一项。推动这项改革的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由国家来控制经济生活的命脉,限制私人资本的过度膨胀,是世界上一切左派思想的基础之一。在这一点上,法国社会党与法共的主张基本一致,只不过法共的意见更为激进一些(对他们来讲,国有化是“与资本主义决裂和结束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的必要准备”。)密特朗认为“这是对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最带根本性的改造”<sup>⑤</sup>。莫鲁瓦总理则相信“通过国营企业的扩大,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会变得更加符合道德的原则。”<sup>⑥</sup>但推动国有化的也有实际因素的考虑。政府希望国有化改革能成为振兴法国经济的转折点。而莫鲁瓦总理又指出:“国有化企业会向国家提供推行其经济政策的必要的决定性手段。”<sup>⑦</sup>

国有化改革涉及到了法国经济生活的最重要的方面:11个大型综合工业集团,全部大中型共计36个银行及两个大型信贷集团,包括大约70万雇员,年营业额达2500亿法郎。这样,加上法国原来就比较发达的国有化部门,法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都实现了国有化。

第二,一系列新的社会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一直是左派的信条。1981年之后,政府陆续采取了以下措施:提高了家庭补助的金额,提高了法定最低工资的下限,将每周工作时间由40小时降低到39小时,将一切劳动者都有权享受的年假(工资照发)由4周改成了5周,退休年龄降到了60岁,提高了雇员在企业中的地位,设立了针对富人的高额财产税。……

第三,地方分权改革。这场所谓的“静静的革命”并不是左派的专利。右派也主张进行这种改革,也曾做过种种探讨。但毕竟是左派政府将它付诸实施。按照1982年的地方分权法,各省的领导权将由国家委派的省长手中转移到民选产生的省议会。大区也正式成为一

级地方行政单位。这项改革的目的是，一方面是在现代国家中日趋重要的地方政治生活更加符合于民主的原则，一方面是提高地方行政的效率，减低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危害。

第四，其他改革。除了以上列举的比较重要的改革之外，左派政府还实行了其他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措施。如通过了新的更富有多元化色彩的广播电视法，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取消了国家安全法院，废除了死刑等等。

总之，1981~1982年间法国政治的突出特点便是不断出台的各种改革。在这个意义上讲，左派政府确实体现了与传统右派政治的不同。

但很快地，经济领域内亮起了红灯。到1983年时，有人甚至认为法国经济已  
4 濒临“破产的边缘”。经济发展速度日益减慢；社会上失业人口由165万上升到了200万；人民购买力下降；法郎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不断削弱。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不断加剧，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左派的国有化改革及扩大公共支出以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同意这种看法，即一项新的经济政策，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成效。但选民们没有这种耐心。那种认为国家的干涉使法国经济失去了活力的看法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1982年的省议会选举及1983年的市镇选举中左派候选人的得票率均大幅度下降，在这种形势面前，政府放慢乃至停止了改革的步伐。现实主义或曰实用主义的倾向在社会党领导层中占了上风。“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的雄心开始让位于如何维持社会党政权的现实考虑。也许正如法国政治学大师施瓦利埃（J.-J. Chevallier）在《法国政制史》中指出的那样：“政治权力有其特有的自身规律。”处于在野党地位时，我们可以放手批评执政党的政策，提出种种富于理想色彩、富有吸引力的方案。但一旦成为执政党，一旦面对各种具体问题，我们便没有权力完全按理想行事了。因此法国的“改革的列车”在1983年即已在实际上停了下来。政府开始实行一系列的紧缩经济的措施。而法共则认识到参加政府可能是一个失策：它既没有在政府中获得关键性的重要职务，不能按照自己的设想行事，又失去了作为在野党的自由。因此法共在1984年7月决定拒绝参加法比尤斯政府，从而结束了左派联盟、两党共同执政的历史。社会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

但是，社会党政府的日趋现实化未能使法国经济状况有明显的改观，也未能遏止住它在选民中声望的下跌。在1986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右翼联盟取得了相对的胜利，保卫共和联盟的主席希拉克成为新的政府总理。从而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左派总统与右派政府的“共处”局面。

我们知道，从宪法学角度上看，法国第五共和国是一个“半总统制”国家，政府及总理负责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但在政治实践中，总统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总理及政府只是他的决策的具体执行者。但这是以总统和政府同为一派为前提的。“共处”的局面出现后，双方只得按宪法的规定划分各自的职权范围：总理负责国内政治的各个方面，而总统则主要分管国防与外交。在有关国内政治的问题上，总统只能扮演一种监督、裁判的角色。这是一种相当尴尬的局面。但密特朗总统确实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艺术。他在耐心地等待形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5 希拉克上台伊始，便在1986年7月5日发表声明：“在年底之前，法国将有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sup>⑤</sup>他希望能尽快有所作为，希望能让选民们在两年后的总统选举之前便看到他的政策的收效，从而进一步赢得总统选举。他在经济

方面的新政策，不仅是对五年间左派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否定，而且是对法国自大革命之前便存在的国家权力过大的传统的否定。他十分欣赏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认为个人能动性应成为振兴法国经济的主要动力。在这方面，巴拉迪尔是他的主要助手；他出任了一个超级部——经济、财政和私有化部的部长，并正式提出了将一部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计划。1986年7月，私有化法案得到通过。它宣布在5年之内，将65个国营企业，特别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私有化。与此同时，新政府又宣称振兴经济、控制失业比实现社会公正更为重要，并采取了一系列自由化经济措施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所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国的经济危机。

但右派并未能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赢得1988年的总统选举。一方面，经济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这种好转并不是决定性的。大部分选民既未感受到右派经济政策的好处，又对他们在社会公正、社会福利方面的倒退感到不满。政界丑闻频出。1986年底新的教育改革法案的出台更引起了数百万学生和其他社会阶层成员的强烈不满。这一切，使密特朗再次于1988年当选为总统。随之，他解散了国民议会，重新举行立法选举。在全部575个席位中，社会党、共产党和其他左派组织共夺得了303席。社会党人罗卡尔被任命为总理，从而结束了左派与右派“共处”的局面。

然而，左派此次胜利，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或思想的，毋宁说是政治的。新的社会党政府不复像7年前那样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提出一个能令人耳目一新、给人带来希望的纲领。接受现实、承认现实的倾向代替了改造现实的雄心。以现实主义的政治主张著名的罗卡尔被任命为总理就表明了新政府的特点。5年中，社会党政府没有推出什么与左派意识形态有关、有左派特色的政策。在左右派冲突最为激烈的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上，密特朗总统只满足于提出“两不”的口号。即一方面不再继续私有化的进程，一方面也不再把已被私有化的企业再次国有化。与此同时，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未能取得成功。在失业率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如果说1981年左派上台时法国失业人口为165万的话，那么到了1992年初失业人口已逼近300万大关。此外还需再加上150万左右领取“最低融入收入”(R.M.I.)的隐性失业者。实际失业人口已占了法国活动人口的15%左右。人民购买力普遍下降，社会上贫富差距和不公正现象比右派当政时甚至还要严重。社会党人看起来已经不再对富人抱有敌意。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马赛的亿万富翁、阿迪达斯公司的前老板达比(B. Tapie)竟然成为了社会党的候选人及部长。政坛上丑闻不断，左派政治家也常常被牵连进去。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失利，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也对法国左派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法国知识分子中传统的左派倾向有所变化。进入80年代以来，我们基本没有看到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份量的批判；不再能看到如萨特、加缪那样的特立独行，对现存社会持否定态度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理想在法国选民中，尤其在青年中的吸引力、号召力与二战之后直到整个70年代时相比大为减弱。最后，社会党内部矛盾的不断尖锐、激化，更加剧了左派的困境。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社会党在1993年立法选举中的惨败。

从上面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出发，我们可以对社会党此次失败的原因做出如下的分析：社会党当年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法国人民对右派的政策感到了失望，是因为他们期望着左派给法国的政治、经济和他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东西。而社会党这次的失利，则主要是因为选民们看到：在1983年之后，社会党政府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思想、纲领和政策；是因

为社会党人没有能够向选民们证明他们可以用不同于右派的方式将法国治理得更好。以不顾现实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来从事政治自然是不可取的。然而屈服于现实的压力，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同样不是正确的选择。1991年左派上台10周年时，《快报》曾在各阶层的选民中广泛调查了他们对社会党10年执政的评价。其中有两个回答是发人深省的。一位中学教员说：“在10年之后的今天，我实在看不出左派与右派的区别在哪里。”<sup>⑥</sup> 另一名农民则认为：“无论如何，我不相信达比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者会去参加轰炸巴格达。”<sup>⑦</sup> 确实，1981~1982年间左派的改革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人们有权问：为什么左派不能谨慎地改进、完善这些改革措施，而一定要放弃自己的纲领和旗帜，去被动地“适应现实”呢？这种“现实主义”的政策也同样未能收到良好效果。选民们也不会因为左派变得“现实”了而投它的票；右派不是比左派更为“现实”吗？因此，我们认为，放弃了对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纲领的追求，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如果不是社会党此次失败的唯一原因，至少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在当今西方学术界有人大谈“政治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的时候，法国社会确实需要一个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旗帜鲜明的纲领。而法国传统的右派和左派都未能满足这一要求，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环保主义者和极右的国民阵线的势力会在最近几年中迅速崛起——他们毕竟提出了新的口号。

那么，右派的这次历史性的胜利是否意味着法国左派政治生命的终结？回答是否定的。诚然，左派，尤其是社会党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在国会中所占的席位急剧减少，政治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内部矛盾尖锐化、表面化。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过的那样，法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左倾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各大工会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巴拉迪尔上台后的第一个许诺就是决不取消已有的社会福利）。同时，对左派政府未能处理好的国内经济问题，右派的政策也未必真有奇效。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左派政党仍有其政治前途。法共在这方面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尽管国际共运遇到了挫折，尽管法共的一些口号相当僵硬，但它毕竟成功地制止了自己的影响力不断下跌的趋势。在1988年后的几次选举中，这个在西欧国家中唯一保留着共产党名称的党的得票率一直稳定在10%左右。因此，如果社会党能够制止内部的意见分歧和组织分裂；如果它能够提出一个针对现实的，有足够号召力和吸引力的，有自己特点的纲领；如果它能够和共产党及其他左派势力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如果它能够巧妙地利用可能出现的国内外有利形势，它就完全有可能在今后的选举中重新获得胜利。

注：① 高盖尔、格罗塞（F.Goguel, A.Grosser），《法国的政治》（*La Politique en France*）1984年 A.Colin 版P.23。

② 马比罗（A.Mabileau），《法国政制》（*Le Système Politique Français*）1985年 Economica 版，P.57。

③ 转引自《法国政制史》（*Histoire des Institutions et des Régimes Politiques de la France de 1789 à nos jours*）施瓦利埃、高那克著（J.-J. Chevallier, G.Conac），1991年 Dalloz 版，P.772。

④ 《世界报》（*Le Monde*），1984. 7. 20。

⑤ 见《法国政制史》，P.867。

⑥⑦ 《快报》周刊（*L'Express*），1981. 9. 4。

⑧ 《世界报》，1986. 7. 6。

⑨⑩ 《快报》，1991. 4. 8。

（作者单位 国际政治系 责任编辑 王毓钟）